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学林旧闻

周维强
◎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学林旧闻

周维强
◎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林旧闻 / 周维强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6.4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 徐雁等主编)

ISBN 978-7-5439-6839-4

I. ① 学… II. ① 周… III. ① 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3146 号

责任编辑: 胡欣轩 王茗斐

封面设计: 许 菲

丛书名: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主编 徐 雁 宋旅黄 王宗义

书 名: 学林旧闻

周维强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21 000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6839-4

定 价: 25.00 元

<http://www.sstlp.com>

序：在书林间的散步心得

◎ 陈星

晚清而下，及至民国，伴随着社会变革与新文化运动的如期而至，中国知识群体中的文化人忽而呐喊、奔走，可谓勇猛精进；忽而沉默、冥想，犹如韬光养晦……各式人等现出多元多样的文化诉求，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生形态。诚然，如此状况自然会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只不过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又增添了新的色彩而已。对于此等诉求和形态，大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和文化界曾有过无数或直白或委婉的评判，但基于被中国学人十分看重的文人性情和文化趣味，对其则相对关注较少。就笔者视野而言，在当今的学人中，几乎用了多半的学术精力和潇洒笔墨涉及于此并倾注无限人文关怀的，大概要数此著的作者周维强先生了。

本书实质上算是一部读书笔记，主要记录

的是晚清以来的学林旧事。形象一点说，这是作者在书林间的散步心得。维强涉笔于此，显然不是率性而行，其中自有若干原委。学术界的各式人等，有的热衷于思潮、流派、热点——当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也有些人，却喜欢选择另一种文化站位，静处一个对学术文化的体察审视角度——这或许更有一番理想主义的藉慰之情。这样的选择，表面上难以看出其在学术文化上的宏图大略，但其注重文人的情怀，有的时候，投诸于此，取势也大。笔者以为，维强正是这样的一位“体察审视”者，他选择的这种学术态度，显然是注重人文，抒发情怀的一路，他以一种现代意识和淡定的学术眼光观照文化，以才情接会前人，汲引近世文明以开启新智。

维强自述此著系“爱仿传统的笔记体，辑录整理，总名‘学林旧闻’，或许可添诸君宴饮清谈之兴会，抑或稍可温故以知新，见微而知著。”笔记体文字自古有之，明清愈见发达。维强喜于晋人《世说新语》的文采风流，以为雅为国人所喜，又羡日人将其视为枕边秘籍。于是他平时闲读杂书，每见书中所载学林人物嘉言懿行，或趣味盎然，或可见世故人情，或稍具史识，或有意义存焉，可喜之余，遂记于片断，乐己愉人，启心励志，而又存哲人之想。其实，现代人如郑逸梅等就钟情于此道，看似娓娓言说，实则意趣无穷。

近十数年来，维强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此种文字数

十万字，其中不乏产生影响者，结集出版的就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和《史思与文心》等。笔者亦曾好于文史小品，尤对笔记偏爱有加。然近年来学思日渐枯竭，鲜有灵感，孜孜于考据，自感已跟不上时代，大有隐匿之想。而维强居然还开写博客，如果读者有意即时了解他在这方面的心得，尽可以在他的博客上见到。相比之下，不能不羡维强为幸福者也。

维强从事文化教育传媒工作将近 30 年，编过报纸、杂志，曾主持创办《教师周刊》并兼任主编，主持总编办工作……先后获得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出版界别）、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业务类）等荣誉。维强的这些文化教育传媒专业工作，实际上是有他的厚实的人文素养作底子，以他的开阔的文化视野作依凭的。所以我还想说，做文化传媒工作，不可不重视自身文化的积累，不可不注意自己的眼界的开阔。而阅读是一条很好的途径。维强或许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有意义的例子。

2014 年秋冬，初稿

2015 年春夏，修改

目 录

序：在书林间的散步心得（陈星）	1
卷一 学问·著述	1
卷二 师友·交游	44
卷三 言语·趣味	81
卷四 风度·人生	111
卷五 学政·世事	148
附卷	
在书林里散步	177
学记	187
后记	208

晋人《世说新语》，文采风流，雅为国人所喜，《傅雷家书》里亦言是日人枕边秘籍。平时闲读杂书，每见书中所载学林人物嘉言懿行，或趣味盎然，或可见世故人情，或稍具史识，或有意义存焉，固隽永可喜。爰仿传统的笔记体，辑录整理，总名“学林旧闻”，或许可添诸君宴饮清谈之兴会，抑或稍可温故以知新，见微而知著。

卷一 学问·著述

19世纪中叶魏源著《海国图志》百卷，提出“识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不幸清廷颞顚，积重难返，未予重视；东邻日本则因是书触发明治维新。

茅以升在南京的江南中等商业学堂念中学，柳翼谋（柳诒徵）先生教国文、历史。学校规定必须住校，功

课很严经常测验，晚间自习，必须自觉地认真复习。茅爱读课外书，如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柳先生不反对读课外书，不主张读死书，有时在自习时间，复习完了，茅读点课外书，柳先生是不加过问的。

柳翼谋先生在东南大学教授历史课，日夜赶抄书；竺可桢先生在东南大学教地理课，终日翻山越岭。校中流传故事曰：竺先生跑断腿，柳先生抄断手。

20世纪20年代，吴梅执教东南大学，唐圭璋从吴梅学。春秋佳日，星期有暇，师生常同游南京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则作词谱曲。学生也常到吴先生家习唱，玉笛悠扬，晚霞辉映，师生唱和，其乐融融。唐圭璋说：我们都学会了吹笛唱曲，对词曲源流及其关系也都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与了解。

语言学家罗常培年轻时学过速记，一分钟能记140个字。在国会两院速记议员们的讲话，议员们操各省方言和蓝青官话，这就迫使罗认真学习方言。

廖季平以善变名，一生治今文经学，六变其说。廖说：“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若三年不变已而庸才，十年不变更为弃才矣。若苦心经营，力求上进，固不能不变也。”

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其门人罗时实等问：“国粹将亡，奈何？”梁反诘：“何以国粹将亡？”对曰：“先生不

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梁勃然拍案说：“从古就是这么少。”

邓之诚上课，不带讲稿，只带笔记本，但他在上课前不见客、不理事，一人静坐半小时到一小时，凝神静气。既上课，口若悬河，一泻不止，遇到引用史书的，随讲随写，拿粉笔于黑板上用端正楷书一大段一大段写出，既快又准确，很少出错。如果有学生课后去他家问问题，那就最受邓欢迎，盖可以因材施教也。

20世纪30年代，唐兰在北京大学讲授古文字学，为古文字研究设了六条戒律：戒硬充内行；戒废弃根本；戒任意猜测；戒苟且浮躁；戒偏守固执；戒驳杂纠缠。

北师大国文系高步瀛先生编选的《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等书，资料丰富，考订详赡，引用材料，着重第一手；对旧注讹误，时有订正。据说他讲课，也很重事实、重证据，考证详实精确，为同侪所敬服。学生对他所注释的诗文，极为珍视，得其一篇，出校教学，可免翻检参考之劳。

陈垣讲课，不是死板地念讲义，而是根据所讲课程的内容，随时加入具体的事例，无论是史学常识、写文章的方法、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甚至文章用字、行书方法、写字规格等，都好像随感式地提出来。至于所记述的近代名人轶事和他们有关学术的言论，尤能引人

入胜。李湘说：听他的课“必须时时专心谛听，稍纵即逝，……丝毫不能怠忽”。

据说，西南联大最受欢迎的全校性的必修课程有两门，一门是冯友兰教授开设的伦理学，一门是中文系开设的“大一国文”。“大一国文”包括“范文阅读”与“作文”两部分，计6个学分。先后教过“范文阅读”的有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王力、陈梦家、闻一多、罗常培、浦江清、罗庸等教授，均为第一流的学者。

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以最高学术奖，汤很不高兴，对同事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

顾颉刚对后学，经常是“你这篇文章好，我给你发表”。陈垣先生教学生是：“你不要胡乱写啊，小时候乱作，老了要后悔的。不能乱写文章啊！”

抗战时期，熊十力先生住在重庆北碚，陆军少将徐复观前去拜谒，请教读什么书，熊教他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徐答以早读过了，熊说他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徐读完后又去。问有什么心得？徐说了许多不同意之处。熊竟然怒骂：“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

处……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出息！”徐被他骂得目瞪口呆，却惊奇他原来书读到这样熟！原来读书要读出每一部的意义！徐认为这一骂对于自己是起死回生的一骂，启发他决心敲叩学问之门的勇气。

数学家华罗庚在西南联大讲课时，不止一次说过：“高水平的教师总能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把难的东西讲容易。反之，如果把简单的东西讲复杂了，把容易的东西讲难了，那就是低水平的表现。”

刘文典精研《庄子》，自视甚高，尝言“普天下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刘文典，半个天下人共分之”。20世纪20～30年代刘文典在清华做教授，一次他从《太平御览》找到一处可以校订《庄子》的资料，喜极而自得，特意在清华宅邸设宴请诸好友。

唐振常称黄药眠先生是“近乎炉火纯青的温柔敦厚的君子”。1945年，唐振常在报纸写文讽刺一位唐以为并无学术的人应邀去美国讲学。数日后黄药眠与唐振常相遇于一个晚会，黄对唐说：这种文章不应该写，近乎人身攻击。如以为材料可用，以后留作写小说可也。

抗战初期，马一浮由重庆去嘉定办复性书院。行前，贺麟设宴为马先生饯行，熊十力作陪。席上，有一

盘菜熊先生尝后觉得味道还不错，叫人把它移得近些，吃得淋漓尽致。马先生则举箸安详，彬彬有礼。任继愈说：熊十力治学豪放不羁，目空千古；马一浮治学温润和平，休休有容。

书的价值不在厚薄。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各仅10余万字，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仅15万字，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仅16万字，但它们都是传世名著。

姜亮夫从成都高师考取北师大研究科，读了一两个月，觉得北师大图书馆书多，先生们的名声又大，很满意。后来又听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极难，又萌生再考清华的念头。当时清华国学院还没发榜，姜去补考，遂被录取。

马廉藏书专收古代小说、戏曲、弹词、鼓词，为前朝所禁行的淫词作品更在所不辞，所以自称藏书处为“不登大雅之堂”。又因藏有明刻孤本《三遂平妖传》，而称其室为“平妖堂”。孙楷第写《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曾经“尽读平妖堂藏书”。

杜亚泉少习传统学术，后受甲午战败之刺激，感慨科场之士热心功名、置国事若罔闻，深觉经史训诂之学为无裨实用，遂翻然改志，绝意仕进，改习数学，由中法而西法，研习代数。

史学宗师陈垣在解放前是从未正式由出版社出过书

的，他的所有著作集为《励耘书屋丛刻》，全部自印，木刻线装。

华罗庚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数学家之一。但他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离开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

20 世纪 30 年代，蔡尚思曾在南京龙蟠里的国立图书馆翻阅了数万卷书。柳诒徵馆长对蔡说：“你把那些书虫都赶走了！我做馆长，从没有人把这么多的书看完。”经过这段读书生活，蔡才觉得进研究所不如进大图书馆，他称大图书馆为“太上研究院”。

王云五曾说：二三十年代的图书“无错不成书”。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诗集《尝试集》（1920 年出版），全书无一错字。

植物学家蔡希陶一面在云南采集植物标本，一面写了许多有着浓郁边地风情的小说。

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时，仍好学不倦。有位张克诚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庙里讲佛学的“唯识”中的“观所缘缘论”，蔡先生居然亲自去旁听。

20 世纪 20 年代初，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青年教师傅种孙就把罗素的数理逻辑名著《算理哲学》翻译到国内。中国现代学术界因此称傅先生是“第一位把数理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人”。

数学家傅种孙讲课，独具慧眼，善于阐微发隐。多

数人以为没有疑问的，他会一句话把你问倒；多数人想不通的，他会一个比喻使你豁然开朗。

1946年春，云南省发生“昆明事变”，城里响了几天枪炮声，华罗庚闭院不出，天天在院子里躺在帆布床上仰观天空中的白云变幻，忽然有一次由联想使他得到了一个美妙的数学新思想。

刘永济曾说：“大家都以为公铎（林损字）只会使酒骂座，可是我和他在东北同事，看到他每天必然温习经书。”

刘永济的著述，篇幅不大，要言不烦，取其足以达意为止，属“简约得其英华”的南派学风。

黄侃性格中还有非常谦虚谨慎的一面。黄侃和刘师培同在北京大学教书，黄认为自己的经学不如刘，就正式拜刘为师。黄以为自己读书很快，但记忆力不够好，所以每要引用一条材料，即使极熟的书，也要核对。黄还对学生说：“我讲小学比较‘自如’，讲经学，拿着书还怕讲错。”

黄侃好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词，但同时也是学而不厌，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黄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疏注》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

能记遍数。”黄侃读吴检斋著作《经籍旧音辨证》，上面和吴先生商榷的批语达四百多条。

20世纪40年代初，王叔岷考入北大文科所读研究生，师从傅斯年、汤用彤诸先生。王向傅呈上所作诗文，并报告将研究《庄子》。傅对王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傅翻看王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汤用彤对学术界称道的章太炎《齐物论释》的评语是章在“乱扯”，告诫王叔岷“要小心”，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功夫”。

王叔岷平生第一部著作《庄子校释》，颇得傅斯年欣赏。傅主动提议为王这部书稿写序，以加褒扬，王答“不必”。隔几天，傅又语王“我跟你写篇序，我跟你先商量如何写。”王依旧说“不必，我自己负责。”王叔岷以为，自己的著作，好坏应由自己负责，不必要前辈夸赞；另一方面此著是自己第一部从事朴学的尝试之作，万一错误过多，岂不累及前辈。故不敢接受傅序。王叔岷两次拒绝傅斯年，傅不以为忤，并即推荐《庄子校释》给商务印书馆出版。

邓之诚常说：“研究学问每年要有所长进。”陈垣常说：“每年要写一两篇有分量的文章。”

胡适谈治学方法，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萧公权后来补充说“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

看书’的阶段”。

周一良在燕京大学读书，选修容庚教授的“《说文解字》研究”一课。容庚教学不涉及许书内容，每堂课由他在黑板上陆续写出楷体字，轮流唤学生上去写出篆书。实际上成为练习篆字，而不是研究《说文》。周一良心里很不满足，向父亲周叔弢谈及，不免慷慨激昂，表示要向老师提意见。父亲告诫周一良：对老师要谦虚，老师的教法必自有其道理，不宜鲁莽从事。周一良由此明白得谦虚谨慎，注意涵养。

邓之诚在燕京大学教书，从不闭卷考试，总是要求学生写论文。

傅斯年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

陆宗达年轻时从黄侃学习上古音、中古音。为了更细致地了解中古音，陆钻研了《广韵》，研究了《集韵》的每一个反切，做了《集韵》韵表，甚至背诵了《集韵》的全部反切。陆尝说：“有些极为聪明的人需要做极笨的工作。”

黄侃对学生说：记日记是很好的方法，既可留下心得，又能锻炼手笔！黄本人即日记不辍。

《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平生用功最多的是《文献通考》。他40岁以前，集中精力为这部书作校注，不只校勘出《通考》刻本之误，也校出马端临编撰之误。后